

《歐美研究》第三十三卷第四期(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801-849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種族歧視外一章——二次大戰前美國 男性華人洗衣人員生活的性別面向\*

王秀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e-mail: jwang@cc.ntnu.edu.tw

### 摘要

本文檢視二次大戰前，以男性為主的美國華人洗衣人員生活中的性別面向，分析種族和性別因素之影響力。論文以洗衣工作為主軸，分析美國女性工作與家庭地位的演變，進而剖析其如何影響身為少數族群的男性華人洗衣人員的生活。研究發現多元種族的美國社會，男性生活中的性別面向，會依種族膚色不同而各有差異，顯示白人社會將性別因素融入其權力結構之中，經由父權體制的運作，使得性別以一種隱喻的方式，傳達和體現種族不平等的社會關係。但是男性華人洗衣人員彰顯洗衣工作的生產意義，用商業經營的模式與專業服務相互連結，藉以沖淡工作中的女性象徵或家庭勞務意涵，並凸顯出他們試圖擺脫美國社會種族歧視和經濟箝制的努力。

關鍵詞：種族歧視、性別、男性華人洗衣人員

---

投稿日期：90.12.19；接受刊登日期：90.12.25；最後修訂日期：92.6.27

責任校對：張逸萍、陳雪美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和林麗月教授與其他多位人士幫忙潤飾文字。

近年來，性別議題已成為許多學科共同關注的焦點。性別(gender)的意義——亦即如何作為一個男人或女人——乃是社會體制建構下的產物，這與男性中心主義強調「男女之別本是天生」的觀點，顯然有別。不同的社會各自以不同的觀念和方式，界定可被接納或可被預期的男性和女性的行為、舉止與態度，因此男女之間經驗的差異和兩性關係的不對等，有許多是社會因素所造成的。社會文化所形塑的男女差異，也凸顯性別作為一個文化表述系統的重要性。

性別研究觸及社會變遷的影響與權力運用的層面。學者針對男女互動模式和男女地位的差別如何影響他(她)們在社會上的權力關係等問題，已經做了諸多討論。男性或女性所顯現的特質、表徵和符號，是人際互動和生理功能兩者交互作用所形成的；而這些特質、表徵和符號會隨著時空轉換而遞嬗。<sup>1</sup> 由於符號表徵對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意義，性別研究在從事解讀或分析時，特別注意性別作為區分社群界限的作用，以及其中顯現的統馭／從屬現象；並由此對不同社會群組利用價值思維、禮儀或行為規範，作為展現權力或加強其地位的行徑，提出適切的說明。

但是性別與另一項社會屬性——種族——之間的交互作用，仍是有待開發的研究領域。美國是個多種族國家，印第安人早在白人到達北美之前，即已在當地生活。英國人憑藉人數眾多和獨得先機的優勢，為美國的制度、宗教、文化和種族關係奠下基礎。此後，隨著黑奴、德國、愛爾蘭移民的加入，美國社會呈現種族與文化的多樣性。一八四九年，舊金山地區發現金礦，開始吸引華人到美國求財致富。西部地區的開發，以及美國內戰後快速的工業發展，使得勞動力的需求大增，造就了勞動人口的流動和重新分配。不但美

---

<sup>1</sup> 有關性別差異的建構理念和男女之間權力運作的關係，參見 Scott(1988: 28-50)。

國本土的鄉村勞動力流向工業聚集的城市，各種不同國籍的外來移民也大量湧入美國。十九世紀末葉開始，來自南歐的義大利、希臘，以及來自東歐的波蘭、俄羅斯和猶太移民，由大西洋的彼岸大量移入美國東岸地區；而中國、日本勞工則橫渡太平洋，進入美國西部各州。

這批移居海外的華人，為開發中的美國提供了廉價的勞力。但礙於移民法規，華工不能歸化入籍成為美國公民。華工為了避免遭受雇主報復而被驅逐出境，不敢組織工會要求提高薪資、改善工作環境或縮減工時，結果反而使得華工更易遭受雇主的剝削、威脅和壓迫。除此之外，白人勞工敵視華工，疑心後者成為資本家的工具，用以對付白人勞工的抗爭或罷工行動。這些因素都明顯導致華人成為階級利益和種族仇視下的雙重犧牲者 (Cheng & Bonacich, 1984: 165-166)。

但是，以男性為主的華工所遭受的經濟和種族宰制，在性別面向上具有許多象徵意義，顯示白人社會裡既存的權力關係。美國勞動市場以「白人至上」的種族歧視機制，將這些膚色各異、又具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族群團體加以區隔分化，使得有色人種 (如黑人、黃種人、印第安人) 被置於低下的社會階級，大大地限制有色人種在就業市場的選擇機會。<sup>2</sup> 由於修築鐵路需要長期暴露於戶外，並耗用大量的體力，於是白人資本家大量引進男性華人，以契約工的方式，從事西部地區的鐵路建設工作。但鐵路完成之後，太

---

<sup>2</sup> 以黑人為例，內戰之後，雖然宣告黑奴解放，但是美國社會卻設下許多種族隔離法 (謂之 Jim Crow Laws)，表面上宣稱黑白「分隔但各自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實則黑人社經地位仍然非常低下；這種情況尤以南方各州最為嚴重，導致私刑 (lynching) 氾濫。進入二十世紀後，在一次大戰期間，美國南方大量的黑人移到北方大城市，替代被徵召入伍的白人勞工，以填補戰時工業發展所亟需的勞動力。但是當戰爭結束白人回到工作崗位後，黑人就被迫離職，或接受毋需技術之低薪又不穩定的職業。

平洋沿岸地區的經濟變化和當地勞資關係的緊張，卻使男性華工成為被攻擊、迫害的對象，他們只好轉而從事男性白人勞工所捨棄的職業(Chan, 1991: 28-35)。越來越多的男性華工因而被迫逾越性別分工界限，從事傳統中所謂的「女人的工作」，如幫傭、廚師、餐館服務生、洗衣人員等。這些特殊的歷史發展，顯現美國多種族的人口結構所引發的問題，並成為學者檢視種族與性別互動的理想園地；多種族意味著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接觸、交流，以及隨後所衍生的接納、調整或抵制。在這些變化中，種族和性別因素扮演何種角色？又如何發揮其影響力？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本文擬由檢視二次大戰前以男性為主的美國華人洗衣人員生活中的性別面向，來探究前述的問題。有的研究指出，種族迫害是華人進入洗衣業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有研究從經營的角度出發，強調洗衣業吸引華人是因為入行的門檻低，如：所需資金少、語言要求低、無須特別技術，並可以滿足自己開業做老闆的想望等因素(Kung, 1962: 180)。另外，有些研究則集中於少數族裔的文化優勢，說明他們如何結合族群資源，經營小本生意(Light, 1972)。以上這些解釋各有其著重點，但是它們對於美國社會大環境裡的性別因素如何影響男性華人的就業機會，或洗衣人員生活中的性別面向及其所涉及的意涵等問題，卻較少分析。

洗衣工作一向歸類於家庭內務，所有人類社會只要有家庭，就必然有人要去擔負這些工作。然而，即使古今中外家務工作內容沒有太大的差異，工作的情境和意義卻非恆久不變。洗衣工作該由誰來做？在何時何地做？或是為何而做(是自願選擇，還是被迫)？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潛藏不同的涵意。華人進入洗衣業的緣由及過程固然有其區域歷史背景的脈絡可循，但不論是在西部開發時期或是東部快速工業化時期，成因均與女性有關(Cheng & Bonacich, 1984: 363-364)。種族歧視造成華人就業困難，再加上當時美國強烈需求

家務勞動力，遂迫使男性華人跨越性別分工的鴻溝，進入屬於女性工作範疇的家務勞動行業。因而這些發展所流露出的性別意義，特別值得深入探討。

就經濟層面而言，工業革命之前，歐洲中古時期的行會制度 (guilds) 只允許男性加入，女性只能屈居於助手層級。工業革命之後，更因為生產模式的重新建構，而出現更嚴峻的性別分工 (Honeyman & Goodman, 1998: 353-376)。另一方面，美國內戰結束之後，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和生產結構發生劇變，直接影響了消費行為，越來越多的人員以出賣勞力來換取工資，再將這些收入在市場進行貨品或勞務交易。許多從前由女性負責在家庭內生產的貨物 (如醃製食品、織布、手工家具等) 和再生產的勞務 (如料理三餐、清洗整理衣物、照顧幼兒等)，逐漸走向市場商品化。

再就社會文化層面而言，隨著家務商品化和性別分工制度愈趨明顯，兩性社經地位的鴻溝也越來越深，因而更加深男性統馭、女性從屬的性別權力關係。在性別分工之下，家庭勞務被歸入婦女的工作範疇，而她們在處理家務過程中接觸生食或骯髒衣物，因此位於權力結構的下層，甚或根本被排除於權力結構外，如印度種姓制度的賤民一樣 (Davidoff, 1991: 64)。此一觀點，對我們分析種族和性別之關係頗有啟發作用。華人以男兒之身從事女性的工作 (洗滌污穢衣物)，其角色因而被「去男性化」(emasculation)，一旦男性華人在文化表徵上被去勢，就只能處在白人社會權力結構的下層。有一則刊載於白人機器洗衣廠同業公會雜誌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的笑話，就是以華人洗衣人員的性別為題材：老師問學生「洗衣婦」的男性代稱 (the masculine of laundress) 是什麼？一個自認聰明的學生答以「中國人」(Chinaman) (Anonymous, 1904c: 50)。將男性華人譬擬成男性化的洗衣婦，說明涉足傳統家務洗衣工作的男人將失去性別的文化特徵，而被認定僅具男人外表，無白人所認

定的男性氣概 (manhood)；<sup>3</sup> 更何況由那個學生口中所說出的「中國人」，是一個充滿種族偏見的輕蔑用語，明白揭示了種族歧視和性別偏見。<sup>4</sup> 正因為這類所謂「女人的工作」多由家務勞動衍生出來，其中的性別意味濃厚，與之相連的文化象徵和權力關係，因而值得特別注意。

本文所謂的性別面向，主要是分析社會體制如何將性別因素融入其結構中，使得性別成為一種表達其他社會關係(如種族、階級、年齡等)的隱喻方式，並同時強化性別上的統馭／從屬關係。論文以洗衣工作為主軸，探究美國女性工作與家庭地位的演變，進而剖析其如何影響身為少數族群的男性華人洗衣人員之生活。此一過程固然涉及男女之間實際接觸的互動方式，但其中的角色期待(亦即在社會規範的建構下，何謂男性角色、何謂女性角色)，以及所顯現的主動／被動立場，卻會因時、因地，以及因人的地位、立場、膚色等狀況而不同。面對不同社群在形塑男性／女性特質時，我們需要釐清美國社會如何利用性別作為文化表徵的工具，並如何從中實踐或抵抗其權力統馭／從屬的運作機制。依此，本文的焦點在於性別角色在何種時空背景和狀況下被界定出來，又是如何體現其中的意涵。

本文運用「美加機器洗衣廠主同業公會」(The Laundryowner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所發行的不同資料，並配合一些華文報紙、口述訪談紀錄，和早期中國人遊歷美國所留下的筆記，試圖對以上問題加以深入探索。首先，筆者將檢視男性華人涉足洗衣工作的緣起，以及華人洗衣業由美國西部往東部和南部發展的情況。文中以市場供需變化為著眼點，闡述華人洗衣

---

<sup>3</sup> 有關美國男性氣概之討論，參考 Kimmel(1996)。

<sup>4</sup> 至於白人機器洗衣廠的男性如何詮釋其參與洗衣工作而不被女性化之問題，參見 Mohun(1999)。

業的興衰過程、美國社會對女傭和洗衣婦的需求，以及此一時期美國女性就業模式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其次，論文將分析在洗衣業發展過程中，男性華人洗衣業者扮演何種角色？他們只是消極回應市場需求？還是曾經主動尋找途徑抗拒美國社會中的性別偏見？若是後者，他們又是如何保衛其作為男性洗衣人員的尊嚴？深入這些問題，可以探究他們對這份工作的態度以及所採取的手段。文中由經營策略和業務內容兩個層面切入，探討男性華人為何選擇商業經營模式（即開設洗衣店），而不是進入白人家庭成為傭僕？洗衣店的營業項目以及館內工作的操作流程和分工，又是如何牽涉性別議題？這些問題的釐清，將有助於我們了解男性華人洗衣業者的性別意識。

最後，當華人洗衣人員的男性角色被扭曲、錯置之後，他們與同在此一工作領域的各色女性人種（如黑人／白人／印第安人之洗衣婦及洗衣廠女工，或是華人洗衣店內的女性雇員等）的互動關係又是如何？這個問題是探索其性別面向時，不可忽略的一環。不同種族的兩性互動之後，如何產生社會規範？又如何實踐此規範？為了讓男性華人洗衣人員生活的性別面向更為鮮明，並從中釐清種族和性別的複雜關聯，本文也將試圖勾勒男性華人與女性同業競爭或合作的景況。

## 壹、由美國社會對女性家務勞動的需求看華人洗衣業的興衰

### 一、早期男性華人職業的情況

一八五〇年代起，華人開始以勞工身分進入美國西部。早期西部開發亟需勞動力的投入，因此以引入男性為主。由於華工不能有

家眷隨行，<sup>5</sup> 所以普遍加強了美國人對這群男人的性恐懼；這股恐懼心態，不僅散佈於多數華工所在的西部地區，更逐漸流傳至全國各地 (Miller, 1969: 76-77; Tchen, 1999: 252-253)。這使得一些美國衛道人士結合種族歧視和性別偏見，為這些男性華工貼上好色、淫穢的標籤，並指稱華工在美國社會的出現，已經對白人婦女的安全構成威脅 (Kim, 1982: 173-213)。

橫貫美國東西兩岸的聯合鐵路西部區段在一八六九年完成之後，西部地區的經濟進入蕭條時期。多餘的勞動力——包含原先建築鐵路的華工在內，在勞動市場上相互競爭，更激化了種族間的對峙，華工從此受到白人的各式凌辱和暴行。除了種族因素之外，這類暴行與性別因素不無關聯，因為對華人施暴者主要是男性白人勞工及其工會 (Cheung, 1990: 240)。

一八八二年的排華法案 (Chinese Exclusion Act) 通過之後，許多美國華人投入洗衣店和餐館的經營，而華人進入洗衣業的時間更遠早於餐館業 (劉伯驥, 1981: 297)。美國華文報紙也曾指陳洗衣業和餐館業對華僑經濟生活的貢獻，如《中國維新報》在討論紐約餐館工人欲組織工人團體時，曾經述及「吾人旅美生計，自咸同以後至光緒中葉，除業洗衣工者，無營利之途可尋。自李傅相 [李鴻章] 遊美後，華僑餐館，開端萌芽。故近年來業此行者，略有起色。」 (《中國維新報》，1918年12月4日，第3版)。可見洗衣業早自咸豐年間 (即一八五〇年代) 至光緒中期 (約一九〇〇年前後) 即已持續成長。洗滌衣物和料理食物都是傳統家務勞動的範疇，這些工作一向由婦女擔任 (她們不是家庭的女性成員，便是由女主人支使的女傭)。由於男性華人逾越性別分工藩籬，從事女性勞務範疇內的工作，使得美國白人對男性華人的定位也逐漸由先前的好色

<sup>5</sup> 一八七五年的佩奇法案 (Page Law) 限制中國女性入境美國 (Peffer, 1986: 28-46)，一八八二年的排華法案則嚴格限制華工家屬到美。



之徒轉為喪失男性特質者。

## 二、男性華人轉入洗衣業的因素

進入美國的男性華人之所以投入洗衣業，與中國社會性別分工的習俗並無任何關聯。洗衣在中國社會一向屬於婦女的家務範疇。一般家庭的女孩，自年少時就開始幫母親照顧更幼小的家庭成員，或料理能力所及的瑣碎家務，如打水、舀水、清洗整理等。以多數美國華人的家鄉——廣東珠江三角洲——而言，男性可能參與的清洗工作，頂多是挑水、提水等粗重工作(Gaw, 1988: 29, 36)。需要雇用外人清洗、整理衣物時，必然優先考慮錄用女性。一九三〇年代，珠江流域地區曾有一些女性外移到東南亞或香港，擔任英國家庭或中國富裕人家的傭僕(稱為阿嬤)。她們的職責包括烹飪、照顧幼兒以及一般家事，如洗燙、清理、折疊等雜務(Gaw, 1988: 91)。由此可見，美國華人所來自的中國東南社會，並沒有男性負責洗衣、清理勞務的傳統。

華人洗衣業崛起於一八五〇年代的西部地區。究其原因，與西部草創初期兩性人口比例失衡的特殊環境有關。當時落磯山脈尚處於未開發狀態，但因為淘金熱而吸引了大批白人自東部而來。這些白人礦工或為單身，或是未攜帶家眷。從前多由婦女擔任的勞務工作(如清洗衣物等)，對於這群男性白人礦工而言，便成為一項生活上的困擾。有些白人就雇請印第安或墨西哥婦女洗滌衣物，偶爾也有男性華工為這些白人礦工清洗襯衫、褲子。但對華人礦工而言，這類工作僅屬於兼差性質，而非主要收入來源(Sung, 1967: 190)。

不過早期另有一則傳說，對華人由礦工轉為洗衣工的情況有所說明：華人為白人淘金客洗滌衣物所能洗出的金沙，遠多於自己親自由河流中所淘出的金沙(Steiner, 1979: 197)。這則傳說隱喻洗衣工作也能致富，至於是否能解釋華人轉行進入洗衣業的緣由，則有

待考證。<sup>6</sup> 但是一項不爭的事實是，一八七〇年男性華人在舊金山擔任白人家庭傭僕者約一千二百餘名，在洗衣店工作者，則已經超過二千人(黃祐寬，1927: 5; Chen, 2000: 65)。<sup>7</sup> 白人並不排斥男性華人從事家務性質的職業。事實上，直到一九〇〇年代，舊金山地區仍以擁有華人幫傭為中上層社會的地位象徵之一 (Glenn, 1986: 106)。有些華人辭去幫傭後，轉而自行開業。他們將洗燙工作變成專職，此舉頗受當時落磯山礦區的白人勞工或鐵路工人的歡迎 (Holt, 1990: 179-181)。排華法案施行之後，華人遷徙至東部者漸多，在美國中西部或東部的許多城鎮，越來越多的華人投入這類行業，到了一九二〇年，全美幾近一半的華人從事與家務相關的服務工作 (Light, 1972: 7)。

至於在中西部和東部地區，男性華人進入這個行業的原因，與

<sup>6</sup> 值得注意的是，這則傳說並未觸及洗衣勞務在性別分工中的性別意義，卻強調其再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的實質經濟報酬之「獲利」面；其中似乎浮現男性父權體制轉化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模式，使男性在此結構中成為主要的收入所得者。尤其可以確定的是，這群為數不少的白人淘金客對於女性勞務——舉凡洗衣、燒飯、縫紉、整理內務——的需求孔亟，在西部缺乏女性的情況下，原先由家中女性成員所提供的無償勞力對男性成員以及整體經濟的貢獻和價值，就被凸顯出來了。淘金時期迅速致富的男性白人，不免願意付出高額酬金以獲得這類服務，因而提升原屬女性勞務的價值。有關此一論述，可參考 Hurtado (1999: 6)。然而，這股實質「獲利」誘因如何轉化傳統性別分工之意識而驅動男性華人進入傭僕、洗衣工和廚師等行業，則因證據所限，無法在此討論。

<sup>7</sup> 陳永 (Chen, 2000) 認為，一八七〇年代於舊金山地區擔任白人家庭的傭僕者多是女性，但是他在書中並沒有提出具體證據，因此筆者對於此一說法存疑。此外，楊碧芳 (Yung, 1995) 曾於有關舊金山華人的研究中，提及舊金山華人社群裡的「妹仔」(mui tai)，但她並沒有指出「妹仔」曾進入白人家庭擔任女僕。不過根據她的研究，這些「妹仔」年紀很小，約僅八至十歲左右，原是作為華人商婦的貼身女僕，算是一種地位的象徵。但是楊碧芳受困於資料有限，無法統計出妹仔的實際數量並了解她們的命運或下落，但也強調以當時的情況，有能力聘僱貼身女僕的華商家庭實在不多，而男性華人社群內對娼妓的需求又十分強烈。從這兩種狀況推估，「妹仔」的主人終不免將這些年輕女孩送入娼館，而不是送到富裕人家去擔任女僕 (Yung, 1995: 40-41)。

女傭之需求有重大關聯。根據一項研究調查，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許多都市的中產階級不斷增加，而且婦女出外就業的機會提高，因此對傭僕的需求有增無減 (Katzman, 1978: 46)，但傭人一職卻不再是女性出外就業的唯一選擇。這種現象尤其以美國本土出生的女性白人最為明顯。越來越多本土出生的女性白人投入其他行業，即使傭人工資再高也不願任職，寧可選擇較具自主性的工廠女工或店員工作 (Salmon, 1972)。這段期間也是美國東部白人家庭雇用人手幫忙家務的高潮期，其中涉及家務工作的職業，包括傭僕、廚師及洗衣婦。

美國東部都會區對於家庭幫傭的需求與時俱增，進而推動了男性華人進入洗衣和餐飲等與家務相關的行業。根據美國全國人口普查資料，登記為洗衣婦的數目急速竄升，由一八七 年的 58,102 人增加至一八八 年的 108,198 人，一八九 年續增為 216,631 人，一九 年更達到 335,282 人。由上面的數字可以看出，洗衣婦人數每十年即增加近一倍左右 (Katzman, 1978: 47)。與此同時，這段時間也見證由西部東移的華人不斷開設洗衣店的現象。一八七二年，芝加哥市的《愛德華工商人名錄》 (*Edward's Directory of Chicago*) 出現第一家華人洗衣店 (Anonymous, 1908: 56; Siu, 1987: 23, 43n)。此後，芝加哥地區的華人洗衣店即由一八七 年代的開拓期進入突飛猛進的爆量成長，於一八八三年逼近兩百家，至一八九三年更達三百一十三家 (Siu, 1987: 26-27)。此外，一八七六年 (光緒二年)，海關官員李圭代表清廷遠赴費城參加博覽會。由舊金山橫貫美國抵達費城之後，他曾經記載對當地華人的觀察。根據他所留下的筆記，費城一地約有華人三百餘人，以洗衣和捲煙為業 (李圭, 1983: 111, 115-116)。至於紐約地區，一八七 年到一八七二年間，據稱有位華人 (Ong Yung) 在曼哈頓查頓廣場 (Chatham Square) 附近開設了第一家華人洗衣店，此後又陸續開了幾家分店，並因而

致富(Tchen, 1999: 250)。由此可見當地對洗衣服務的大量需求。另外，繼李圭之後，太常寺卿陳蘭彬出使美國、西班牙(指今之中美)、祕魯三國時，也曾經記載有關紐約地區的情況。在他的《使美紀略》中述及，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時，「此埠(紐約)有華人約千七、八百，住勿除(Mott)街，以洗衣、捲煙為業」。而根據陳國維(Tchen, 1999: 237, 248)的研究，一八八一年紐約市人口普查資料中，全市居住於所謂唐人街地區的華人不及五分之一，其餘多散佈各地，此一現象應與當時華人所從事的主要職業——洗衣人員和傭人——有關，因為他們不是寄宿於白人家庭的傭人，便是在白人住家附近開設洗衣店。<sup>8</sup>到了一八八六年夏季，當時出使美、西、祕魯等國的大臣張蔭桓接見紐約中華會館眾商家時，曾經記載「華人在島約(紐約)傭工者幾五千人，大都以洗衣為業」(張蔭桓，1983: 131)。與此同時，有一位中國觀光客王詠霓由歐洲經美國返回中國時，曾途經紐約，他也述及洗衣和生產雪茄煙是紐約華人的主要職業(王詠霓，1983: 157)。紐約華文報紙主筆黃清福(Wong Ching Foo)在一八八八年估計曼哈頓大約有兩千家華人洗衣店；此外，大約有八百至九百家散佈於布魯克林，還有一百家左右在紐澤西州澤西市(Jersey City)(Tchen, 1999: 249)。所以當時紐約地區若以三千家華人洗衣店來估算，每家若只有一位操作員，則至少有三千人；若每家有兩位操作員則總計有六千人。平均而言，也有四千五百人左右，證諸張蔭桓所謂「傭工者幾五千人」的說詞，確是所言不虛。

由上可見，十餘年間，紐約、芝加哥等大都市的華人洗衣店已成長數倍、甚至數十倍了。到了一八九一年代末期，則有一位美國白人宣稱，在大紐約地區約有八千家華人洗衣店(Beck, 1898: 58)。不過，一九一一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住在曼哈頓和布魯克

---

<sup>8</sup> 一八八一年代，紐約的唐人街(或稱華埠)已漸具雛形。分佈區域以勿除街為主，並向外延伸。

林的華人只有 6,321 人，遠少於上述白人作者所觀察到的數目。然而，不論是由於兩者對紐約市地理界限的定義有所差異，或是因華人恐懼非法身分曝光，而使得人口普查的華人數目少於實際總數，可以確定的是，數以千計的男性華人進入洗衣業已是不爭的事實。來到當地的華人，顯然嗅到這股商機，華人洗衣店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於美國東部和中西部的城鎮。有些大城市如紐約等，洗衣業甚至成為當地華人最重要的職業 (Tchen, 1999: 250-251)。<sup>9</sup>

### 三 華人洗衣業由盛而衰的變化

華人洗衣店的成長趨勢到了二十世紀初期的十數年開始有些停滯，<sup>10</sup> 主要是受到大型機器洗衣廠的影響。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一四年，也就是一次大戰爆發前，美國大型機器洗衣廠不斷擴大營業。在此期間，機器洗衣廠所雇用的勞動人力增加約五分之一 (19.3%，亦即從 124,214 人增加至近 150,000 人)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13: 887; 1923: 1027)。由於傭僕、廚師、洗衣婦的需求增加，刺激了商業型態家務服務 (如麵包店、洗衣店、餐館) 的出現或家電用品 (如洗衣機、電熨斗等) 的問世 (Katzman, 1978: 49, 51-52)。以大型洗衣廠的營業額為例，目前最早的紀錄為一九一九年的 104,680,086 美元，一九一四年增加為 142,503,253 美元，到了一九一九年則達 236,382,369 美元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75: 320)，是十年前的兩倍以上。面對機器洗衣廠的強大競爭力，華人洗衣店自然沒有太大的成長空間。

<sup>9</sup> 針對眾多華人洗衣人員的各種生活與業務需求，唐人街裡的中國雜貨店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協助，如融資、短期住宿、醫療服務、收發信件、代書信件或是匯款回家等。

<sup>10</sup> 舉例而言，一八九三年到一九一三年的十年間，芝加哥華人洗衣店的數目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Siu, 1987: 30, 37)。至於紐約市地區則有一份一九一七年市政府衛生局的調查報告指出，當時的華人洗衣店約有一千兩百家左右，遠少於十數年前 Beck (1898) 所宣稱的八千家 (Department of Treasure, 1917: 230)。

然而一次大戰後，美國經濟進入一九二〇年代的繁榮期，一般家庭收入增加，造就社會大眾對於洗衣服務的強烈需求，整體洗衣業也因此而蓬勃發展，華人洗衣店的發展也出現重大變化。大型白人機器洗衣廠的年營業額，在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之前達到歷史高峰——541,158,197 美元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75: 320)。強烈的需求也使得華人洗衣店拋開了之前飽受白人機器洗衣廠擠壓的陰霾，分享洗衣市場的大餅。在紐約地區一場由台山學友會、開平勵進會等僑社團體和華僑學校共同合辦的「華僑經濟略史」演講會中，黃祐寬 (1927: 5) 指出，在東部和中西部地區，華人洗衣業和餐館業特別興盛，並言「業此者而獲厚利，頗不乏人」。此外，一九二〇年代也是華人洗衣業的一個轉型期，有些華人開始投入資本，開辦機器洗衣廠，紐約、波士頓、芝加哥等大城市都有例證 (Nienburg & Blair, 1936: 17-18)。<sup>11</sup> 至於費城地區，有些華人洗衣店則是利用白人機器洗衣廠的水洗服務，先將衣物清洗乾淨，再拿回店內進行放漿、熨燙的後續作業 (Chen, 1948: 88)。

一九二〇年，全美華人中有 23% 從事洗衣業。一九三〇年因為經濟大蕭條的效應，則減少為 18%，造成華人洗衣店走向沒落之路。若以州別而言，紐約州任職於洗衣業的華人是加州的 2.5 倍 (但加州擔任傭僕的華人則是紐約州的 2.8 倍)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30: 97)。雖然在二次大戰期間，洗衣業曾短暫地再現榮景，但是受戰後免燙襯衫的出現、家用洗衣設備的普及，以及美國華人就業機會增加的影響，新生的第二、三代華人已不願再棲身於工時長、收入卻已大不如前的洗衣業。以紐約為例，一九三〇到一九五〇年間，洗衣業已經不再是華人就業的首要選擇，而是改由其

---

<sup>11</sup> 這類機器洗衣廠只提供機器清洗和脫水的水洗服務 (wet-wash)，不負責烘乾漿燙的工作。後者由各個小店自行用手工處理，洗衣過程形成上、下游分工的模式。其中的優勢見下一小節有關華人洗衣服務的業務內容之分析。

他行業 (如餐館業或是漸露頭角的車衣業) 取而代之 (Kwong, 1979: 61)。而留存下來的華人洗衣店大多只提供代收衣物的服務，再將收到的衣物轉送到其他華人經營的大型洗衣廠、燙衣廠去處理。這種經營型態簡易的華人洗衣店，便成為一些已婚婦女的家庭副業 (Lee, 1960: 266-267)。至此之際，華人洗衣業的氣勢已日漸消蝕。

## 貳、男性華人洗衣人員之經營策略與其性別意義

如前所述，美國華人洗衣業的興起與女性有極大關聯。不論東西部華人進入洗衣業的原因為何，其中無不與女性人口多寡或是一向由女性所提供的家務服務需求有關。以下章節將分別由商業經營型態和業務內容兩個方向，探討男性華人洗衣人員的經營策略以及其中所透露的性別意義。

### 一、商業經營型態

一八七 年代之後，男性為主的華人移民逐漸進入以家務服務為主的各種行業。為什麼有些男性華人會選擇商業型態的專業洗衣店為其本業？可能因為此行業不需要許多事前訓練，卻有不錯的報酬，並擁有較高的自主性。西部傭人的工資一向高於全國其他地區，一八八 年到一九 年間，該區平均每千戶人家擁有的傭人數目，低於全國趨勢，又由於缺乏歐洲移民以及較少女性黑人前往，以致於人力供應不足，因此，對於傭僕的需求遠高於全國其他地區 (Katzman, 1978: 56)。<sup>12</sup> 但是，為何西部華人沒有大量投入傭

<sup>12</sup> 在傭僕需求劇增的情況下，商業型態的家務服務 (如洗衣店) 便應運而生，並有很大的成長空間。但是因為西部地區對華人的歧視與迫害不見改善，因此華人數目日減，以致於當地華人洗衣店的發展並未超越東部地區。倒是白人所經營的大型機器洗衣廠快速成長。根據一九一 年勞工部的普查，僅加州一地就有三百二十一家機器洗衣廠，超過東部許多人口眾多之州，僅次於紐約州的五百家和伊利諾

人一職呢？一項有關洛杉磯地區的華人歷史研究 (Lou, 1982) 指出，在一八七〇到一九〇〇年間，白人家庭的傭人月薪大約在四十至五十美元之間；洗衣店的工人月薪為三十美元左右；一般零工 (day laborers) 則是按日計酬，一天約有一美元的工資，但工作不穩定。固然傭人的工作報酬最高，但是在美國家庭擔任傭人，必須經過一段漫長的學徒訓練，以獲得從事美式家庭勞務所需的技術，而學徒時期的薪水並不高。相較之下，自己開設洗衣店，從事清洗衣物的工作，便成為當時西部華人可以接受的就業選擇。

至於東部地區，早期華人洗衣店的收入則是相對可觀。一八九〇年代中期，根據一位任職於紐約華埠教會佈道機構的女性白人觀察，當地華人洗衣人員的週薪約八至十五美元，外加住宿費用。洗衣婦 (不論是白人還是黑人) 的週薪則是四到十美元不等，不含住宿。但是她也說明，男性華人洗衣人員的工時遠超過洗衣婦，經常由早晨八點一直忙碌到凌晨一、二點 (Clark, 1896: 110)。

梁啟超在一九〇三年遊歷北美地區時，曾經對美國華人各行各業的就業人數和薪資加以比較。其中任職洗衣業的華人約有四萬人，遠遠超過名列第二的漁業人員的一萬餘人；其他行業者則都不超過三、五千人。為何從事洗衣業者多如過江之鯽？根據他的說法：「洗衣業實在美華人最重要之職業也，東部諸省，十有九業此。其工價最廉者，每禮拜美金八、九元 (約每月合華銀七十元)。最昂者，每禮拜二十元 (約每月合華銀百六、七十元) 以此至賤之業，而庸率如此其大，故趨之若鶩」 (梁啟超, 1983: 202-203)。顯然梁氏不以洗衣工作為高尚職業，但重要的是，他道出了這項工作不需事前訓練卻有相對豐厚物質報酬的特質。當梁氏拜訪賓州匹茲堡時，曾經提及當地工資是全美最高，而「華人在此者，照例仍以洗衣工

---

州的四百四十八家，名列全國第三，主因即為西部各州的傭人供應不足。有關機器洗衣廠的成長變化，參見 Mohun (1999: 50)。



為獨一無二之職業。以此賤工，而每來復(禮拜)所入，自美金十七元乃至二十二元。視內地候補道一局差，優之遠矣」(梁啟超，1983: 196)。<sup>13</sup> 對於從事商業型態洗衣工作的男性華人而言，他們是用勞務換取工資，這種行為與一般家庭主婦從事無償性質的洗衣家務有所不同，其經濟意義特別明顯。但是根據梁啟超的分析，在美國華人所能擔任的行業裡，廚師(不論是任職於餐廳或私人家庭)和幫傭的酬勞是最高的，大約較洗衣從業人員的報酬多出三分之一，而且東部地區的工作機會稍多於其他地區(梁啟超，1983: 203)。<sup>14</sup> 美中不足的是，廚師與幫傭雖然領有高薪，卻要時時受到主人的支使和監控；相較之下，開設洗衣店(一如西部地區華人賃地而耕所從事的蔬果業)則可以擁有較高的獨立性和自主權，故能吸引許多華人投入其中。這群男性華人寧願選擇任職於薪資較低但卻是同族又同為男性所開設的洗衣店，也不願擔任白人家庭的廚師或傭僕，其中的意涵，隱然浮現華人洗衣人員企圖掙脫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和就業的箝制。<sup>15</sup>

<sup>13</sup> 這樣的工資水平，較之於匹城鋼鐵廠提供的工資亦毫不遜色。鋼鐵廠的工人每日工作十小時左右，工資約一塊半到一塊六毛五美元(Wu, 1983: 79-80)。

<sup>14</sup> 這也證明前一節所說明的現象：雖然西部地區是因為缺乏女性人口，而造成男性華人從事所謂「女人的工作」，但美國東部卻沒有因為整體男女比率相近，而減少對傭僕、廚師、洗衣人員的需求，甚至還因為女性人力投入不夠，轉而接受男性華人擔任傭僕、廚師、洗衣人員。此外，梁啟超的文章也提及洗衣店的收入不遜於西部種植蔬果一業。

<sup>15</sup> 若要探討一個族群如何衡量其種族、性別和經濟利益三者間之關係，可以參考美國黑人的經驗。黑奴解放後的南方社會，不論是鄉村或城市地區，黑人的首要願望就是脫離奴隸時期白人所加諸的種種制約，重新創造可以由黑人自主的家庭和社群。但是當種族和性別兩個因素有所衝突時，情況就變得相當複雜。以女性黑人為例，種族因素往往優先於性別因素的考量，亦即若男性黑人能在就業上免除種族歧視的遭遇，女性黑人才得以免去身為黑人又同時為女性的雙重弱勢，卸下她們因男性黑人就業不易而肩負經濟和家務的雙層負擔(Estes, 2000: 153-170)。相對於女性黑人的考量標準，美國男性華人的情況如何呢？囿於現有史料不足，無法多作說明，但此一議題值得他日繼續探討。

就性別面向而言，若將幫傭與開設洗衣店相比較，男性華人捨棄高薪的幫傭工作而在洗衣店工作，可能還有一層公／私領域的性別考量，其中也糾結了種族歧視的因素。以公／私領域的觀點而言，自十九世紀開始，資本主義萌芽並推動經濟轉型，家庭以及和家庭相關的勞務工作逐漸被隔離成私領域，以有別於公眾所關注的政治和工商活動，而女性的角色也被強調必須與家庭有緊密的關係 (Elshtain, 1981)。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初期，華人男傭曾被白人婦女雜誌 (*Good Housekeeping*) 譽為家務工作的最佳幫手 (Di Vernon, 1891: 20-22; Faison, 1906: 279-280)。但是在初期語言不通時，他們需要女主人不斷地重複示範與時時監督，才能逐漸習得處理美國白人家務的技能。這些華人男傭對於女主人教導他們處理家務的情境——亦即男性和女性在私領域接觸，但彼此權力關係卻是女尊男卑的現象——到底抱持何種觀感？這點因為尚未有具體資料或研究成果而不易得知。但是有些華人男傭藉著上主日學之名，早早離開主人家裡；有些華人男傭則在工作一段時日之後，要求加薪或是擁有足夠、舒適的居住空間 (Katzman, 1978: 222)；也有華人男傭於工作數年後累積足夠的資金，轉而開設洗衣店 (Holt, 1990: 179-181)。由這些例證似乎可以看出幫傭一職的侷限性而凸顯出洗衣工作的獨立自主。華人洗衣店的從業人員雖然不可避免地會與女性顧客來往，但彼此的關係是在商業的公共領域進行，應該比身處白人家庭的私密領域中直接受女主人指揮差遣，更可以保持其男性尊嚴。

男性華人對「洗衣店」一詞的使用法，還透露出他們如何略過洗衣工作所隱含的性別表徵。于仁秋在其有關紐約華人洗衣店的研究中，述及返回廣東台山的金山客，常自稱在美國開設「衣衫館」(或簡稱「衣館」)而不是「洗衣店」。但中文的「衣衫館」語意模糊，可以指稱任何和服裝有關的商店，因而在家鄉裡造成一種錯誤

的認知，以為闊綽的金山客是服裝業的商人；而金山客也沒有刻意澄清衣館的工作內容，以滿足自己的尊嚴。到了一九三〇或四〇年代，新抵美國的華人一旦真正了解洗衣業工時之漫長與工作內容之艱苦時，皆大嘆不如留在中國家鄉 (Yu, 1992: 28-30)。更何況二次大戰前許多美國華人仍以返回家鄉為念，這種短暫的寄居心態 (sojourner mentality)，使得他們不會在乎美國社會可能附加於該項勞務的性別屬性。一項以費城地區男性義大利移民建築工為主要的研究 (Dickinson, 1984: 209) 指出，有些低薪的移民工人會形塑出一種屬於移民特有的性別意識。這些男性勞工因為遠離家庭，沒有女性家人為其提供具有再生產功能的家務勞動，所以就互相合作以便有效地完成家務工作。例如他們在建築工寮內輪流烹煮三餐，儘量自己炊食而不上建築公司的餐廳用餐，以省下可觀的伙食費。義大利工人用集體負擔的方式來節省開銷，以便盡量將所得寄回家鄉，維持家計。類似的情況也出現於華人社群之中，許多華人洗衣人員的三餐是由館內特定成員負責炊煮，或是輪流分擔。湯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 的小說 (Kingston, 1980: 61) 也描述其父年輕時所任職的洗衣店，四個朋友 (都是男性) 利用賽跑競賽方式，決定每餐飯後由誰洗碗。

華人以外來移民身分進入美國社會，希冀在短期內獲得最大經濟成就的心態，使得他們不會計較在寄居社會中所扮演的性別分工角色。對男性華人而言，當面對家鄉的中國社會時，可以保持他們身為家庭經濟生產者的地位，才是最重要的。林語堂有一本英文小說 (Lin, 1948: 26)，以二次大戰期間紐約一個開設洗衣店的華人家庭為背景。小說中剛到美國的小兒子和小女兒為了男人是否應該洗女人的衣物而發生爭執，他們的父親回答：不論清洗男人還是女人的衣物，靠洗衣賺錢乃是營生之計，無關性別。這段敘述說明男性華人洗衣人員把寄居美國期間所從事的洗衣工作視為謀生的工

具，其經濟意義淡化了工作中所涉及的性別因素。同樣的，當小兒子詢問父親為何選擇洗衣為其志業時，父親回答，雖然洗衣工作非其所願，但至少足以養活在中國的家人，甚至讓妻小到美國團圓。雖然沒有更深入的資料，可以具體顯現男性華人洗衣人員對商業型態洗衣店所隱含的性別意識的看法，但由以上資料可以看出，男性華人在當時美國種族歧視的社會氛圍下，可以憑藉經營商店的方式在短期內累積相當財富，寄錢回鄉以養家活口，維持其男性中心的經濟生產角色。

## 二、業務工作內容

西方世界的專業洗衣，可以回溯至希臘羅馬時期。在羅馬時代，除了少數貴族在自家擁有洗衣設備和工人之外，多數人家都將換洗衣物交由專門人員負責。這類工作人員有男有女，他(她)們有自己的店面，擁有輸水和儲水等設備，並且組織行會以保護其權益(Rousset, 1917: 197)。<sup>16</sup> 工業革命以後，專業洗衣店已在英國出現(Mack, 1929: 757)。可惜沒有更進一步的資料可以查證這類店家的業務內容，以探究其中的性別意義。但是隔著大西洋的對岸，一八二九年在美國紐約上州，有一家製造男性襯衫及分離式衣領和袖口的廠商，已經附設清洗部門，專門洗滌自家的產品(DeArmond, 1950: 1-2)。不過這時並沒有使用蒸汽動力，也尚未機械化，因此只能算是小規模的經營。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染衣店兼營洗滌衣物的工作，也算是小型商業經營的店家，但是並不只限於染整、清洗男性的衣物。<sup>17</sup> 直到美國內戰之後，洗衣店才逐漸以男性衣物為主要的

---

<sup>16</sup> 有關早期西方的專業洗衣模式，另見 Anonymous(1939: 80)。

<sup>17</sup> 在棉布通用之前，不論男女，其貴重衣服的清洗多採用染色的辦法，亦即當衣物過髒時，將它染為另一種更深的顏色。有關這類由染衣店兼營清洗工作的例證，可參見 Edward(1879: 146)。

營業項目。<sup>18</sup>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結構下，機器替代人力，製造程序不斷簡化，技術工人(多是男性)的地位因而大為下降。為了降低成本，資本家轉而雇用薪水較低的女工，男性員工為了遏止這股趨勢的持續發展，轉而將專業技術性別化。當他們界定所謂的「專業技術」時，工作內容不是重點所在，操作者的性別才是關鍵(Phillips & Taylor, 1980: 79-88)。<sup>19</sup> 在男性中心的社會裡，洗衣工作一旦由男性操作時，即特別強調這份工作的專門技術和服務的對象，這種現象可以解讀為是順應男性優越感而出現的獨特需求。洗衣店(不論是機器洗衣廠或手工洗衣店)的業務內容逐漸反映男性優勢與專業服務相互連結的現象。他們利用洗衣的專業和專屬特性，以區隔自己與一般家庭主婦或洗衣婦的不同。

十九世紀末，洗衣店主要的兩項營業項目是男性襯衫與床單、被套、床罩、桌布、餐巾或毛巾等平面方塊物件(稱為 flatwork)。後者不論面積大小，因為平坦無弧度或綳褶，從清洗、脫水、熨燙到折疊，都可以由機器來處理，不需勞煩手工操作，因而按重量計價，是白人機器洗衣廠的獨佔業務(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52: 15.13)。遺憾的是，雖然我們確定早在一八七〇年代，華人洗衣店就已經出現在東部都會大城，卻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了解當時華人洗衣店的服務細目。不過十九世紀末有一份資料記載華人洗衣店的營業項目和收費標準：一個分離式男性襯衫衣領、兩個袖口、一塊手帕，以上各項收費都是兩分錢，襯衫主體則是十分錢(Beck, 1898: 59)。由此可以推測華人洗衣店自開業以來，應該是以處理男性衣

---

<sup>18</sup> 這種營業項目，稱為「單身包裹」(bachelor bundles)。到了一九四〇、五〇年代，則稱為「包裹業務」(bundle work)。

<sup>19</sup> Phillips & Taylor (1980) 檢視英國製衣工業裡的車衣技術，發現男女工人同樣運用機器，但是男性被視為熟練技工，女性則只算是半技工。

物為主要營業項目。

一九二〇年代之前，男性襯衫並不同於今日的樣式，當時衣領和兩個袖口與襯衫主體分開，再藉由鈕扣之類的設計相連，以利於拆卸清洗。一般人換洗襯衫時，只是將最容易沾染污垢的領子和袖口拆下清洗。洗衣店在處理男性襯衫時，不但要清洗乾淨，最重要的是依照顧客所要求的硬度調製漿水，掌握泡漿時間，再經過高溫整燙，顯出其中的弧度、平順和光澤，因此這類送洗物品都是按件計價。由於清洗男性襯衫所要求的水準較高，不同於一般家常衣物的清洗方式，故逐漸走向專業，成為洗衣店的經營重點。紐約市一位作家瓦拉赫(J. G. Wallach)回憶，一八八〇年時曾在一家位於市區的洗衣店前大排長龍，等待一個小時，才得以從洗衣店的小窗口領回送洗的衣領和袖口。而清洗代價所費不貲，僅僅清洗漿燙一個衣領就要美金五分錢。一八八〇到一九〇〇年間，紐約市(當時只含曼哈頓島)和布魯克林的洗衣店如雨後春筍般四處林立，最初這些店純粹以清洗漿燙男性襯衫的衣領和袖口為主，日後才逐漸擴及整件襯衫和其他男性衣衫的配件(如手帕等)。雖然紐約地區有不少機器洗衣廠，但更多的是由中國人和非中國人所經營的小型手工洗衣店(hand laundries)。它們提供較低廉的價格，店面則多散佈於鄰里巷道間，以方便周圍的鄰居送衣物來清洗。進入二十世紀之後，紐約地區擁有全美品質最優良、但價格卻最便宜的洗衣服務。該作家認為由於生意興隆，使店家能薄利經營(Anonymous, 1909d: 16)。

一次大戰前夕，處理男性襯衫的分離式衣領和袖口，仍是洗衣店最大宗的營業項目。<sup>20</sup> 商業洗衣服務既然以處理男性衣物為主，又由男人來操作，在父權體制下，自然被視為具有專業技術特質的行業，而與一般主婦、女傭、洗衣婦的家庭洗衣模式有所不同。男

---

<sup>20</sup> 事實上，不僅北美地區，許多歐洲國家的洗衣店也是以男性衣領和袖口為主要營業項目(Taylor, Hurwitz, & Held, 1937: 2; Mohun, 1999: 51)。

性衣物的清洗漿燙逐漸走向專業化的特性，主要表現在它與一般家庭換洗衣物有別而分開處理的現象，這種情形尤以東部的城鎮最為顯著。以鄰近紐約市的布魯克林為例，男性襯衫上的分離式衣領和袖口幾乎都送到專業洗衣店去處理，一般家庭主婦或洗衣婦的洗衣工作已經不再包括這個部分了(Anonymous, 1909b: 18)。<sup>21</sup>

然而一次大戰期間，機器洗衣廠擴大營業項目而往家庭洗衣服務發展，將家中不同成員之衣物送外清洗也逐漸為社會大眾所接受。<sup>22</sup> 然而清洗男性衣物的業務仍受到重視。一九二〇年代初期，有位白人機器洗衣廠的老闆即透露，漿燙男性衣領和袖口的生意依然利潤豐厚(Fletcher, 1922: 102-103)。男性衣物一直是洗衣店業務

<sup>21</sup> 此外，一般家庭會送到洗衣店清洗的物品還有平面方塊物件，尤其是不易清洗的床單、床罩、被套等。

<sup>22</sup> 造成改變的主要原因是，大戰時期許多女性投入戰備後勤的工作，婦女出外就業則勢必無法如平時一般承擔所有的家務，將換洗衣物送外清洗的需求自然大為增加。洗衣服務的項目，也就由男性衣領、袖口、襯衫擴及到全家人的衣物(Anonymous, 1915: 26)。一九一六年初，白人機器洗衣廠同業公會之專屬刊物(*National Laundry Journal*)特別於其新年感言中，勉勵會員把服務對象由男性拓展到家庭中的其他成員，並聲明此類家庭洗衣服務將成為洗衣工業未來發展的重要趨勢(Anonymous, 1916: 2)。

機器洗衣廠對於開拓以全家為對象的洗衣服務，表達了極大的興致和憧憬。此後洗衣工業的發展，確實是朝著此方向進行，這一點可以由機器洗衣廠的營業項目和加設的機器設備明白顯示。家庭洗衣服務大約可以分成三類：(一)水洗服務：只負責清洗衣物，脫水之後就送還客人，由客人自行漿燙。(二)半成品家庭服務(semifinished family service)：除了提供水洗服務之外，還將一些平面方塊物件(如毛巾、床單等)加以烘乾但不漿燙。(三)全成品家庭服務(finished family service)：提供清洗、脫水、漿燙等全程服務。第一類價格低廉，第二類方便，這兩類服務在二〇年代最受一般家庭主婦的歡迎(Anonymous, 1921a: 78; Anonymous, 1921b: 90; Anonymous, 1922: 1; Laundryowner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1927: 18-19)。有關洗衣廠因應此一發展而加添機器設備的介紹，見Best & Erickson(1930: 2)。三〇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時期，機器洗衣廠在上述三大洗衣服務類別之下又另設細目，各有不同的收費標準，以因應克難時期的需求(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52: 15.13)。

重心，即使在經濟大蕭條的一九三〇年代，全家換洗衣物中，最有可能外送到商業洗衣店去處理的仍是男性衣物。一九三三年，芝加哥一家白人機器洗衣廠將處理一件男性襯衫的價格，由當時通行的十二分錢降為六分錢，迫使其他廠家不得不跟進。在此不景氣時刻，由於降價所以才能促成營業量大為提升；即使後來價格又回漲到八分錢，依然維持相近的營業量 (Schwartz, 1937: 24-25)。這種現象顯示，一旦顧客習於穿著專業洗衣店 (不論是大型機器或是小型手工店家) 所處理過的衣物，即使在經濟困難、收入縮減之時，仍會將洗燙費用視為不可減免的開銷。尤其對一家之主而言，更可能以他所需的花費為優先，因為父權體制下，男性中心的優勢自然重視男人的生產價值與福利。當襯衫、衣領、袖口和手帕已經成為男性在工作與許多場合不可或缺的配件時，自然就造就了商業洗衣服務獨具的性別特色。

清洗男性衣物顯然是高利潤的行業。華人洗衣店不但掌握此一趨勢，而且還與白人機器洗衣廠競爭。在一八七九年，華人洗衣店已經被美國機器洗衣廠的同業認定為一大威脅 (DeArmond, 1950: 208)，很可能是因為兩者的營業項目相近而引發利益衝突。十年之後，在白人機器洗衣廠同業公會的年度大會上，華人洗衣店帶給機器洗衣廠的威脅性又再度被提出來討論，顯然彼此競爭的情況依舊 (Boyce, 1894: 124)。一次大戰前夕，白人機器洗衣廠處理一個分離式衣領的成本為一毛五分，卻要價三毛；同樣的工作，華人洗衣店只要價兩毛。在這樣的收費標準下，就算華人洗衣店花費的成本與白人機器洗衣廠同樣是一毛五分 (但可能更低，因為華人洗衣店的機器設備和雇員數目皆不及白人機器洗衣廠)，還是有高達百分之二十五的淨利率 (Anonymous, 1914a: 30)。

愛荷華州一家白人機器洗衣廠的負責人，就曾明白點出華人洗衣店精明之處：華人洗衣店一開幕營業，馬上以漿燙分離式衣領為



首要營業內容 (Anonymous, 1914b: 10)。這段話還顯示華人洗衣店似乎仍然以男性衣物為營業要項，並沒有受到機器洗衣廠的影響而轉向家庭洗衣服務。一九二〇年代以後，男性襯衫不再使用分離式的衣領和袖口，而逐漸流行如今日所見的樣式（即衣領、袖口和衣身連成一體）。如此一來，機器處理的方式就不如手工處理之具彈性。因為機器處理放漿時是將整件衣服都漿勻，有時衣背硬挺，衣領卻顯得過於僵硬，會傷害頸部；而手工處理則可以依個別顧客需求，在領子或不同部位調整漿量，做出不同的硬度。華人洗衣店隨顧客喜好而有所變通的作法，使白人顧客寧願多花一點費用，將質地好、需要特別處理的衣物送到華人洗衣店，也使得華人洗衣店以此特點，可以和資本雄厚的大型白人機器洗衣廠相互競爭（羅記瑞，1979: 199；張滿理，1983: 323）。這一點可以說明為何華人洗衣店仍然以清洗男性衣物為其主要業務項目。到了三〇年代經濟不景氣時，有些華人洗衣店不得不接納女性衣物，但也多半是一些需要使用手工、特別小心處理的高級衣物，如百褶裙、蕾絲紗龍裙等。白人顧客認為，比起使用機器的方式，手工洗滌的衣物可以更耐久一些，更何況蕾絲紗龍的物品內層多，不用手洗實在無法處理（雷卓鋒，1983: 334）。

其實華人洗衣店並非全用手工而沒有借助於機械。以芝加哥為例，白人開設的機器洗衣廠四處林立 (Mohun, 1999: 51)，與華人經營的小型手工洗衣店經常產生競爭與排擠的現象，使得芝加哥華人洗衣店在十九世紀末的發展受到重大打擊。但是一次大戰期間因為不少女性投入戰時軍需工業，家庭例常勞務不得不依賴餐館和洗衣店所提供的服務。當時華人餐館大發利市，而餐館所需換洗的桌巾、餐巾數量不少，也連帶推動華人洗衣業再度勃興。芝加哥華人洗衣店的數目由一九一三年的三百六十八家增加至一九一八年的五百二十三家。到了一九二〇年代中期，一些稍具資本的華人更投

資開設機器洗衣廠，而華人洗衣店的總數於一九二八年（經濟大蕭條前一年）已經超過七百家（Siu, 1987: 31, 34）。這些華人投資的機器洗衣廠，為華人經營的小型洗衣店提供水洗服務，後續的漿洗、熨燙過程，再由各個洗衣店自行負責（謝英明，1983: 137-138）。華人洗衣店數量最多的大紐約地區，也在一九二〇年代相繼開設數家華人投資的機器洗衣廠，經營方式也和芝加哥地區頗為雷同（Yu, 1992: 138）。機器與手工洗衣店以上下游分工的方式，將勞動量大的清洗工作委由機器處理，更為男性華人所經營的洗衣店增添專業技術的色彩。華人機器洗衣廠也透過各種分工凸顯男性華人的專業地位，凡是需要大量體力勞動的工作，主要由黑人或波多黎各裔的男性擔任（尤其是將清洗過後但尚未脫水的笨重衣物，由洗衣槽移至脫水機等工作）。至於男性華人則負責清潔劑的調製、稀釋以及機器的操作，而這些工作不光是體力勞動而已，還需要具備專業知識（Tom, 1981）。

男性華人洗衣人員運用勞動轉換物質酬勞的方式，凸顯洗衣工作的生產意義，以沖淡工作中所涉及的家務意涵和女性角色象徵；再將男性優勢和專業服務相互連結，以維持男性為權力中心的機制。就如林語堂小說中男主角的父親所言：我們幫老美洗衣做飯，因為我們華人比美國人更會洗衣煮飯（[w]e wash America and cook America because we wash better and cook better）（Lin, 1948: 73）。雖然從林語堂的小說中，看得出早期美國華人進入洗衣業確實頗為無奈。<sup>23</sup> 但是從早期男性華人在西部地區不得不替其他男性白人洗衣煮飯，到後來掌握時勢潮流而將洗衣工作發展成一項專門行業，透露出男性華人對這份工作的投入已經超越為了生存而做的掙扎。

---

<sup>23</sup> 原文中提及“ There was no other way. All you have is a pair of hands, and you do what the Americans do not want to do and allow you to do ”（Lin, 1948: 27）。

## 參、男性華人洗衣人員和女性洗衣人員的兩性互動

既然男性華人跨足傳統的女性工作場域，他們與女性業者間的競爭和衝突將勢所難免。但檢視男性華人洗衣人員的這類性別經驗，卻發現兩者間存在著頗為複雜的關係。以下論文將與男性華人洗衣人員有所接觸的女性洗衣人員，分成四個不同的團體：(一)洗衣婦；(二)白人機器洗衣廠之女工；(三)妻子；(四)女性雇員。由她們和男性華人洗衣人員的互動過程可以看出，除了性別關係之外，種族和階級的因素也不可忽視。

### 一、洗衣婦

洗衣婦是與男性華人洗衣業者互動最頻繁、也是最久的一群人。早自西部淘金時期，兩者之間已有接觸；到了十九世紀末，彼此互動愈趨頻繁。一八六〇到一八八〇年間，在西部內華達州的礦業大城維吉尼亞市，男性華人所開設的洗衣店與該市愛爾蘭裔洗衣婦或印第安洗衣婦，以及數量不多的白人大型機器洗衣廠之間，存在著一種既是共存、也是競爭的關係。在落磯山區的新興礦業城鎮，不少單親的愛爾蘭裔婦女為了撫養子女而成為洗衣婦。另外還有一些印第安婦女向白人學習洗衣和漿燙襯衫的工夫後，以替人洗衣維生。但是這些洗衣婦的經營規模較小，僅能算是家庭副業。她們多半透過親朋鄰人的輾轉介紹，收集數個家庭或單身公寓房客的衣服來洗滌，賺取家用。尤其是愛爾蘭裔洗衣婦的顧客群，多為同族裔的人士。此一現象似乎顯示，愛爾蘭裔洗衣婦與訴諸本土白人顧客的華人洗衣店因為顧客群不同，彼此間並不一定有利益衝突 (James, Adkins, & Hartigan, 1994: 173-175)。一八七〇年代後期，反華的情緒日益高漲，波及華人洗衣店的生意；從中獲利最多的，

卻是同樣訴諸白人顧客、由本土男性白人所經營的大型洗衣廠 (James, Adkins, & Hartigan, 1994: 176-177)。

雖然乍看之下，男性華人和男性白人的商業衝突，似乎多過於男性華人洗衣人員和愛爾蘭裔洗衣婦的競爭。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愛爾蘭裔洗衣婦之所以會劃地自限，只接納自己族裔的顧客群，而沒有開發其他族裔的生意，已經反映出男性華人所開設的洗衣店對她們的衝擊；換句話說，具有再生產意義的家務勞動受到商業經營模式的侵入之後，傳統社會建構下的性別分工也隨之轉變，取代女性擔任洗衣家務的是全職且標榜提供專業服務的男性。

在蒙大拿州布特鎮 (Butte) 的例子，則涉及性別議題與種族、階級兩項因素互動的現象。從一八七一年開始，因為礦業發展的高峰已過，華人在布特鎮的人數不斷減少。經濟蕭條使得白種工人因為就業機會減少而恐懼華工廉價競爭。布特鎮的公會成員 (都是男性) 以道德勸說方式，籲請白人家庭不要光顧華人洗衣店，而改聘女性白人為傭僕或洗衣婦，以免後者因為就業機會有限而淪為吧女或妓女。白人洗衣廠的資本家，則苦於華人洗衣店所帶來的商業競爭壓力，也順應潮流而響應之。到了一八九一年代初期，一場排華運動於焉而生 (Frisch, 1984: 3-13)。這個排華運動表面上是經濟衝突引發種族對立使然，但深入探究，卻透露出男性中心的父權體制結合階級統整的特性。亦即男性白種工人恐懼華工的競爭，卻以照顧女性的道德責任為訴求，排擠華人；這項訴求使得不同階級的男性白人暫時放棄自身的利益考量與歧見，共同對抗少數族群的男性華人。雖然男性白人以前並不在意男性華人洗衣人員與女性白人競爭，但是在布特鎮當時的社會氛圍中，白種人強大的歧視力量激使男性白人借題發揮，開始聲援其同族女性而淡化了性別差異的色彩。甚至於不同階級的男性白人還可以在照顧婦女的男性優越意識之下，藉由反華的共同點而凝聚起來。

男性華人洗衣人員和白人洗衣婦的競爭關係，除了出現在西部礦區城鎮，也發生在美國軍隊中。一九一九年西岸舊金山第七十軍海岸炮兵團 (Seventieth Company Coast Artillery) 宣佈，將錄用兩名男性華人負責洗滌所有衣物的工作，卻遭到原先洗衣婦的抗議，而這些洗衣婦都是軍人的妻子。主其事的上尉聲稱，由於士兵對軍中衣物的清洗品質迭有怨言，再加上經費的考量，才有這項改變 (Anonymous, 1909a: 16)。不論上述兩個因素到底孰重孰輕，這個例子說明華人洗衣業提供了價廉物美的服務。但其中可能也隱約顯現男性和專業技術相連的象徵意義。對士兵而言，男性華人洗衣人員的專業模式有別於那些軍人妻子的副業模式。而對男性華人而言，提供服務給同是男性的軍人，並無性別角色調適上的困難。

男性華人洗衣人員和洗衣婦在都會城市的競爭關係，也值得注意。有些例證直接點出華人洗衣店對傳統洗衣婦的影響。例如一八九九年時，著名黑人社會學家杜柏依斯 (W. E. B. Du Bois) 針對費城黑人社群所做的調查 (Du Bois, 1996: 102-103) 發現，一些黑人洗衣婦和洗衣店 (包含華人洗衣店) 之間存在著商業衝突。有些例證則是間接的，尤其反映在洗衣婦人數漸減的現象。有一項研究統計發現，一八八〇到一九二〇年間，美國城市人口雇用洗衣婦的比例逐年遞減。但這並不表示需求減少，而是受到洗衣店勃興的影響；此外，家電用品逐漸問世也是原因之一 (Katzman, 1978: 59, 60-62, 72)。<sup>24</sup> 最好的例子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紐約市。當時中產階級逐漸成型，他們對生活品質與清潔標準的要求皆提高，但受限於都會居家空間的狹小，使得他們寧願選擇將衣物送外清洗，而不是雇用洗衣婦到家中清洗。以曼哈頓地區為例，小型洗衣店三步一

---

<sup>24</sup> 但需注意的是，洗衣店的出現造成洗衣婦人數減少的現象較少出現於南方各州。這是因為南部白人家庭多延續奴隸制度的習慣，而習於雇用女性黑人擔任傭僕或洗衣工。

家、五步一間，到處可見，反而罕見洗衣婦到家裡來清洗衣服。因此，有些洗衣婦必須在報紙刊登廣告以吸引顧客。一九二五年間，紐約《布魯克林之鷹報》(*Brooklyn Eagle*)的求職欄，就有四十則黑人洗衣婦刊登的廣告(Anonymous, 1905a: 14)。<sup>25</sup> 這種情況間接說明了男性華人進入洗衣業對傳統洗衣婦的衝擊。

但是美國南部城市的情況則與北部有些不同。許多女性黑人自奴隸制度施行以來，就一直負責家務勞動的工作，如幫傭、洗衣等。解放之後，由於男性黑人的就業機會受限或工作不穩定，黑人婦女不但婚前必須分擔家庭經濟重任，即使婚後仍然繼續出外工作，成為重要的家庭經濟來源。這群女性黑人與男性華人洗衣業者之間的競爭衝突，因而顯得特別深刻而尖銳。一九二五年，有一些華人洗衣店被維吉尼亞州瑞奇蒙市(Richmond)的黑人洗衣婦聯盟(Wash-women's Union)列入黑名單，成為其抗爭與抵制的對象之一。她們指責男性華人從事洗滌衣物的工作，逾越了性別分工的界限(Anonymous, 1905b: 40)。

女性黑人利用性別分工的觀念以保障自身有限的就業機會，其中的性別意義固然重要，但不可忽視的是，這群脫離奴隸制度的女性黑人，在面對華人族群時，難免會恐懼因膚色不同而受到華人的種族歧視。內戰之後，有數百名華人在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修築鐵道，或到南部喬治亞州開鑿運河。工程完成之後，有些華人繼續滯留南部，並轉業開設雜貨店或洗衣店。南方的華人洗衣店是以白人顧客為對象，因而出現與當地黑人洗衣婦對立競爭的狀況。尤其女性黑人出外就業的選擇有限，又多半從事與家務有關的工作(如傭人、洗衣婦)。而男性華人以專業、專職方式開設洗衣店，不啻瓜分了女性黑人的就業機會，因而彼此對立。只是男性華人洗衣人員和

---

<sup>25</sup> 紐約市多小型手工洗衣店而少洗衣婦的現象，亦見於 Mohun(1999: 51)。

黑人洗衣婦的對立關係，不應該被誇大。有一項研究比較美國西部與南部地區華人洗衣店的數量，結果顯示兩地差異頗大，原因之一是西部從開拓時期以來，女性人口一直偏少，因而接納男性華工擔任家傭、僕役或開設洗衣店。但是南方並沒有女性人力缺乏的問題，排華法案施行之後，前往美國南部的華人並不多，更因為南方對黑人的種族偏見一向嚴峻深刻，華人反倒因而受惠，他們在當地受白人歧視的程度低於西部地區，此外為數不少的南移華人開立以黑人顧客為主的雜貨店 (Loewen, 1971)。因為就業型態的差異，華人在南方城鎮開設洗衣店的數量遠比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少，他們與黑人洗衣婦的直接利益衝突也就有限。

## 二、白人機器洗衣廠之女工

男性華人洗衣人員的女性競爭對手，除了洗衣婦之外，還有一些是任職於白人機器洗衣廠的女工。機器洗衣廠雇請工人，其性別分工的模式大致如下：男性負責出外收送衣物兼推銷業務；廠房之內，男性工人負責將待洗衣物放入洗衣機、調製清潔劑、控制機器運轉速度和時間長短等 (Mohun, 1999: 95)，若機器尚無進水設備，則尚需要抬運清水，注入機器內；等到衣物清洗完成後，再將溼重的衣物送入絞衣機或脫水機。最後這道手續尤其需要強大的體力，因為尚未脫水的衣物大都非常沉重。由上可見，男性工人主要負責外務，或是需要大量勞力的工作。女性則負責漿燙和折疊等工作，然而工作環境非常惡劣，得長期處在高溫潮溼的場所，而且為了避免已經清洗乾淨的衣物受到外面灰塵沾染，窗戶多是緊閉；工作辛苦，工資卻遠低於同廠的男工，因而經常發生女工抗爭事件。

一八七七年，德州蓋維斯頓市 (Galveston) 白人洗衣廠的黑人女工，因為不滿低薪而發動抗爭與罷工行動，她們也要求當地華人洗衣店於十五天之內關門離城，否則將加以報復。由這個事件觀之，

黑人女工似乎將華人洗衣店等同於白人洗衣廠。雖然華人洗衣店利用機器操作的程度和雇用員工數的規模，皆不及白人洗衣廠，但對女性黑人的就業機會仍構成威脅（這個例子與前述黑人洗衣婦聯盟頗為相近）。因此洗衣廠的黑人女工抨擊男性華人洗衣人員不去從事男人的工作，卻侵入女性的工作範疇，搶了婦女的飯碗 (Hunter, 1997: 78-80)。<sup>26</sup> 這個例子說明同為少數民族的黑人和華人，在白人至上的美國社會中，彼此為爭取有限的生存空間而造成種族相爭之實，卻藉由性別之名而表現出來。

東部的城鎮所發生的洗衣廠白人女工抗爭事件，則可與上述案例對比其中的意義和內涵。一九〇四年，俄亥俄州托利多鎮 (Toledo) 有一群機器洗衣廠的白人女工發動抗爭，要求改善工作環境和提高每日工資。在這段抗爭期間，為了解決顧客的不便，女工所組織的委員會發出聲明，籲請客人將待洗衣物送到華人洗衣店，而不要送到阻擾罷工行動的白人洗衣廠 (Anonymous, 1904b: 2, 56)。這群女工最大的考量主要在制衡資方，權宜之計乃央求顧客轉送衣物到華人洗衣店。這項做法，顯然並不認為開設洗衣店的華人與機器洗衣廠的白人資本家同屬一個陣營。她們因為勞資糾紛而凸顯出的階級意識，似乎已經超越了華人洗衣人員以男性為主體的性別意識，或華人乃非我族類的種族意識。這群白人女工，不論在美國本土出生或是外來移民，種族意識可能不如曾經經歷奴隸制度的南方女性黑人強烈，但對於上下層社會生活分野與地位差距，以及由此而凝聚的階級意識，則無疑非常鮮明。尤其在這一段期間，白人機器洗衣廠蓬勃發展 (Mohun, 1999: 50)，這些白人資本家對於先前早已存在的小型華人洗衣店不斷加以詆毀、污衊和打擊。面對資本雄厚的機器洗衣廠，華人洗衣店的規模和營業型態，只能算是小本經營的勞

---

<sup>26</sup> 這群在德州蓋維斯頓市 (Galveston) 的華人，可能是一八七一年修築路易斯安那州與德州鐵路的華工，在鐵路完成之後繼續留居該地 (Barth, 1964: 196)。



動者。白人女工將經營洗衣店的華人視同下層勞工階級，而非資本家階級，似乎可以理解。更何況在白人勞工階級中，男女性別分工的意識是否如中上層社會人士般強烈，令人存疑 (Lamphere, 1987)。因此，男性華人洗衣人員和機器洗衣廠內的白人女工之間，因為彼此分享下層階級意識而產生的善意可能多於兩者因為性別不同而產生的競爭關係。

### 三、妻子

華人洗衣人員中，在美國組織家庭者並不多見。少數有家室者，其妻子是中國人、白人(多為移民)或黑人。梁啟超 (1983: 194) 曾經指出，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東部的華人中，擁有家庭者遠少於西岸的華人。他認為這種現象是「道遠往來難之所致」，亦即美國東部與中國家鄉的距離比起西部更為遙遠，往返更為不易。這個解釋顯然忽視了美國諸多移民法案嚴格規範女性華人入境美國的事實；尤其東部華人多屬勞工階級而非商人階級，受到的法律限制更多，想要將家人接到美國團聚談何容易？更何況華工的經濟能力是否足以負擔全家人在美國的生計，也是一大疑問。不過一九四三年之後，隨著排華法案的廢止與戰時特殊狀況的需要，美國開放了男性美籍華人妻室入境的規定。

在有家眷隨行的男性華人洗衣人員中，其中國妻子多半會幫忙照顧和經營洗衣店的生意。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紐約一對華人夫婦共同經營洗衣店，經過一段時日後，這對夫婦攢足資本並轉業到他們心目中更好的行業——中式雜貨店 (Dong, 1923: 8)。林語堂的小說 (Lin, 1948) 也曾經對洗衣店老闆娘協助經營生意的情形稍有著墨。這間洗衣店最初由父親和大兒子一起經營，經過多年的努力後終於存夠了錢，將仍在中國的家人(母親、小弟和小妹)接到紐約團聚。從此之後，母親還身兼丈夫和大兒子的工作夥伴。這位母親不

僅將顧客的住址熟記腦海中、留意生意版圖的變化，還小心而誠實地處理送洗衣物中留下的物品。有一次，一位女性顧客將一張百元鈔票遺留在送洗衣物的口袋中，母親特地差遣小兒子將百元鈔票送回，此舉不僅贏得這位顧客的感謝，還因此大力推薦這家華人洗衣店給左鄰右舍。由此可見老闆娘在經營洗衣店上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華人洗衣店有女性家人加入，其勞務分工仍是沿襲傳統的男女分際而行。林語堂筆下的這家華人洗衣店老闆娘，特別細心地縫補送洗衣物中鬆脫的鈕扣或裂開的邊線。這些免費但貼心的額外服務，是吸引顧客的一大誘因 (Lin, 1948: 73)。這一點所呈現的性別意義是，縫補衣物等針線工作屬於女性勞務範疇，即使在男性華人經營的洗衣店裡，若有女性家人參與，則仍由女性操作，延續男女性別分工的形式。

即使華人洗衣店的老闆娘不是華人，她們參與洗衣店營運的例子也很常見。紐約一家華人洗衣店的老闆娘是個白人，這對夫婦於一九〇五年搬入紐約。白人妻子除了幫忙華人夫婿工作外，也頗為樂意接受一些和中國有關的事物 (Dong, 1923: 17)。此外，蕭振鵬 (Siu, 1987: 285) 針對一九三〇、四〇年代芝加哥地區華人洗衣人員所作的研究中，描述了一些男性華人和女性黑人的婚姻。其中，一位華人在伊利諾州南部小鎮 (K 鎮) 和另外兩位華人共同開設洗衣店時，可能因為他的英文聽說能力較佳，便負責出外收送衣物的工作，因此而結識了一位黑人顧客的姪女，並共組家庭。而後，這家華人洗衣店生意下滑，他就轉到芝加哥去謀生。經過一番波折之後，他仍然投入洗衣業，在湖街 (Lake Street) 開起洗衣店。最初他們一家人 (包含黑人妻子和一個兒子) 就住在洗衣店的後半面，前面則作為店面和工作場所，一如許多華人洗衣店的經營方式。當生意忙碌時，黑人妻子自然會幫忙照顧生意。三、四年之後，洗衣店的生意大不如前，他就將店面轉到房租較為便宜的 D 街去，繼續營

業。雖然這時他的家人另外賃屋而居，但是當生意忙的時候，他的黑人妻子仍會到店裡幫忙，而且通常是全家一起在店裡用餐 (Siu, 1987: 286)。

但也有較為特殊的例子。紐約一家僱有六名員工的華人洗衣店，其中國老闆娘不但不為男性工人料理飲食，反而由工人自己在洗衣店內烹調三餐，並送一份給在附近居家的老闆娘 (Dong, 1923: 8)。顯然這個洗衣店規模不小、生意不差，可以讓妻子免去一些家務勞動的責任；也可能是因為女性華人人數極少，不願意或不被允許在男性的華人圈裡出入。<sup>27</sup> 此外，賓州費城一家華人洗衣店的老闆娘則明白拒絕在洗衣店內幫忙。這對夫妻於一九一五年結婚，一九二六年訴請離婚，因為妻子宣稱自己來自高尚的上層社會，堅拒在洗衣店內工作。這宗離婚申請，使得他們成為費城華人圈中第一宗離婚案例(《民氣日報》，1928年2月21日，第8版)。<sup>28</sup> 但以上這些例子應屬例外。對於多數華人洗衣店老闆的妻子而言，雖然她們不識中文，甚至使用英語交談的能力非常有限，不足以應付生意所需，但是她們幾乎不可避免地需要分擔洗衣店的工作和照顧生意 (Dong, 1923: 12, 20)。

不過男性華人對於妻子參與洗衣店經營一事，有時會難以接受而流露鬱悶之情。紐約華埠有一家洗衣用品供應商，其母親是當地華人洗衣業界的女強人。母親家庭源自檀香山，父親則出生於中美洲，最特殊的是，他的父母不是在傳統媒妁之言的撮合下結為連

<sup>27</sup> 華人社會對男女之防的觀念仍然非常封閉，舉例來說，華埠的唐人戲院內，男女觀眾就是分席而坐 (Yung, 1995: 45)。若有已婚女性與他人私奔，則成為華人新聞(「懸紅通緝廣告」)的主角。這類廣告會將男女雙方的照片登於報上，具有警惕的意味(《中國維新報》，1927年7月18日，第4版)。

<sup>28</sup> 可惜這則新聞報導並沒有說明妻子是否為華人。不過，美國華文報紙對於非華人者，通常會說明為白人或黑人等，這則報導卻略去不談，因此筆者猜測該名妻子可能是華人。

理。即使如此，現實壓力仍使婚姻蒙上一層陰影。一九二八年夏季，當時才十三歲的這位供應商，隨同父親和家中兄姊由檀香山遷到紐約市與母親同住；能幹的母親早已在紐約市布朗區 (Bronx) 與人合夥開設一家機器洗衣廠。不久之後，母親獨自開設另一家機器洗衣廠。有了如此能幹、獨立的妻子，他的父親自遷居紐約之後就一直鬱鬱寡歡 (Chu, 1982)。

此外，湯亭亭的自傳性小說亦曾經提及，其父因受白人社會壓制，無法順利謀得一職半業以養家糊口，只能靠著全家人的幫忙，開設一家洗衣店；當面對家中作風強勢的母親，以及美國社會濃厚的種族偏見時，父親一貫地以沉默回應，並於午夜夢迴時喃喃嚙語，以宣洩內心的挫折和無力感。除此之外，受主流白人文化壓制而居屈從地位的父親，也會將怒氣發洩於妻子、女兒身上，出現怒罵、詛咒女人的行為 (Kingston, 1980: 13-14)。神情落寞、雄風盡失的父親，看在身為其女的作者眼中，只能歸咎於養家之累。作為一家之主的父親，雖是堂堂男人，卻必須忍受美國白人社會的種族歧視和男性被去勢般的雙重壓制 (Goellnicht, 1992: 201)。以上兩個例子都點出：男性華人在美國白人社會裡，只能侷限於少數幾項職業 (如洗衣業)，當適應不良而無法善盡養家活口的責任時，其心中的壓力和鬱卒之情便非常沉重。

#### 四 女性雇員

男性華人洗衣人員和非華人女性雇員之間的關係，也呈現種族和性別兩相糾葛的複雜性。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盤之前，芝加哥地區約有一百家華人洗衣店曾經雇用女性黑人從事熨燙的工作。根據一份美國勞工部的調查，這些女性黑人的工資高於在白人機器洗衣廠擔任同樣工作的女性。但經濟大蕭條之後，華人洗衣店的生意大不如前，必要時只雇用同族的華人為幫手。波士頓地區有一些華人機

器洗衣廠提供水洗服務，為了避免白人抱怨華人企業只雇用同族人，他們不得不雇用一些女性白人操作簡易的機器、熨燙平面物件 (Nienburg & Blair, 1936: 18-19)。<sup>29</sup> 紐約地區有些小的華人洗衣店只有一人獨營，工作忙碌時則雇用臨時工幫忙。而臨時工多是自己的親友，或經由熟識的華人朋友介紹的人選。到了一九三〇年代，該地眾多華人洗衣店開始雇請女性黑人幫忙工作。目不識丁的華人洗衣工方富爾與前《美洲華僑日報社》業務主任張滿理如此形容他們所觀察到的黑人女助手：

美國黑人是受壓迫最深、受歧視最重的民族，他們常受失業飢餓的折磨。黑人婦女大多數是善良忠厚的，請她們幫忙兩三天，每天給予兩三元的報酬，她們連聲道謝，並懇求下次再叫她來。(羅記瑞，1979: 188)

他們對黑人女幫手的觀點，頗有彼此相憐而相濡以沫之意，但也揭示受到白人社會壓抑的男性華人，在與弱勢族群的女性黑人互動中，重拾其性別優勢，而顯現出幫助弱小並施捨對方一些好處的意味。但是當兩者之間有同居關係時，卻很少發展成正式婚約，也極少生育後代。同居一段時間後要分手時，黑人女助手「走得很乾脆，不留給雇主一點麻煩或負擔」(羅記瑞，1979: 189)。這樣的現象更進一步顯示兩性權力的不對等。<sup>30</sup>

<sup>29</sup> 早在一九一九年時，一些白人機器洗衣廠就已經抱怨華人洗衣店不雇用美國人，因而無助於創造美國社會的就業機會。他們其實是用這類說詞來詆毀華人對手 (Anonymous, 1909c: 10)。

與美國對照來看，加拿大則有一條法規限定亞裔人種不得雇用女性白人為員工。尤其該國華人，一如美國地區，多是開設餐館和洗衣店，雇用女性遠比男性便宜，而加拿大又極少黑人可雇用。因此這一條文對華人影響不小。有關此條文和其相關判決案例，見 Backhouse (1994: 34-53)。

<sup>30</sup> 事實上，男性華人與女性黑人不是沒有具體婚姻關係，前述伊利諾州 K 鎮的華人洗衣工和女性黑人的婚姻即是一例。但是這類異族通婚的情況，容易因雙方皆無

另一方面，男性華人照顧女性的男性優越心態也有它的負面效應。在美男性華人多為單身或沒有家眷隨行者，使他們因為寂寞難耐而容易為異性所玩弄。男性華人因此付出的代價，有時是錢財，如雇用的黑人女助手，了解華人老闆藏錢之處而伺機偷竊（羅記瑞，1979：189）；<sup>31</sup> 有時則是由複雜的情慾關係發展成喪命的悲劇。<sup>32</sup>

---

法進入彼此的族群團體而成為邊緣人。當這位洗衣人員的兒女結婚對象不是華人時，他的老年生涯只能寄託在芝加哥華埠裡，悔恨當初沒有替自己存一筆錢，以備年老時能落葉歸根回到唐山老家去（Siu, 1987: 280）。至於美國南方，許多華人開設雜貨店，以黑人為主要顧客，其中有些男性華人娶黑人為妻是因為南部華人較少，無法凝聚成一個華人社區，於是就和黑人社群來往頻繁（Loewen, 1971: 59, 61, 66-68）。

<sup>31</sup> 華文新聞刊載一則消息，紐約市一家華人洗衣店的黑人女助手利用一份電報欺騙老闆。因為華人老闆不識英文，這位黑人女助手將之傳譯，謂該電報由市政府發出，要求該老闆到警察局去。當華人匆忙離去後，女助手便趁機下手行竊（《美洲華僑日報》，November 11, 1940: 7）。

<sup>32</sup> 以下列舉數例做為說明。其中所提的男性華人有些是餐館人員，有些無法確認是否為洗衣人員。但二次大戰之前，因為洗衣業和餐館業為東部華人經濟的重要支柱，許多華人常於兩種行業中穿梭變換，因此可提供參考。紐約一白人婦女，與曹如相識之前已經嫁給一位白人，私逃之後再暗嫁另一白人。一日被人發現死於曹如房內，曹某陳述其與該女相識三載，因女方患病甚烈，故賃屋供她養病。雖然不知該女到底是被殺，還是服用刺激性藥品過量而死；但華人曹某之說法，顯示其照料該女的行徑，似乎有男性優越之心態（《民氣日報》，1927年2月15日，第3版）。中部聖路易則有一位年老的華人餐館老闆黃篤，一向以黑人為主顧。某日黃篤被人發現陳屍於臥室地板上，桌上留有半瓶毒藥，到底是自殺或他殺，不得而知。據稱死前一夕，曾約一名黑人妓女到房。黃某素來不願與華人來往，即使和美國人交往，也自認屬於黑人。由這個例子可見，白人社會種族壓制之深，使華人（尤其是如黃篤之老年華人）自外於美國社會，轉而認同亦受種族迫害的黑人，因此他可能與女性黑人關係匪淺（《民氣日報》，1927年2月25日，第3版）。另有一例，紐約一華人餐館人員馮德和白人妻子已經結褵九年，其男性華人朋友麥某因而識其妻子，卻曾挑逗該女，為後者所拒，因而槍殺馮德和其妻子再自盡（《中國維新報》，1927年4月12日，第4版）。

## 肆、結語

二次大戰以前，因為移民法規限制中國女性入境美國，或嚴格管制華工家屬到美，導致華人社會成為單身漢群聚的型態，所以美國華人社群以男性為主。這些華人，因為美國社會多種族的特質，使其生活中的性別面向益形複雜。男性華人洗衣人員的性別意識或是洗衣行業中的性別意義，因證據所限，仍然有待深究。

本文檢視華人洗衣業的興衰，發現它與美國女性人口數、地位和就業等情況有極大關聯。由一八五〇年起，不論是在女性勞動力極缺乏的西部，或是在快速工業化的東部，美國社會一方面擴大了對女傭、洗衣婦的需求，另一方面婦女的就業機會提高且就業型態也漸趨多元化，這些變化促進商業型態的家庭服務業(如洗衣業)的興盛。當男性華人逾越性別分工藩籬，擔任女性工作(如傭僕、餐館服務生、洗衣工和廚師等)時，美國社會可能也逐漸忽略他們的男性角色。就如父權體制將男性置於權力中心而邊緣化女性一般，華人洗衣人員一旦被白人認定不具男性特質而將其角色去男性化，他們便只能處在白人社會權力結構的邊緣。此舉同時暗示在種族權力結構上，白人是位在結構的中心點，華人只在邊陲；美國白人社會將性別因素融入其權力結構之中，經由父權體制的運作，使得性別以一種隱喻的方式，深化種族不平等的社會關係。

華人進入洗衣業固然有其區域歷史背景的脈絡可循，但是男性華人並非只是被動地回應。檢視男性華人在洗衣一職的不同層面——不論是商業經營型態、業務內容、工作操作流程，或是和女性同業的關係等，在在顯示男性華人努力掌握機宜，創造最符合他們生存的處境。他們以男性之軀投入洗衣工作之後，將具有再生產意義的家庭勞務改變為商業經營方式，避免觸及洗衣工作在性別分工中歸屬女性的性別意涵，轉而強調洗衣作為再生產勞動時所能創

造的物質回報，以此凸顯父權體制結合資本主義的市場供需模式，使男性仍然是家庭的經濟支柱。因此，男性華人從事洗衣行業是不同於從前女性在日常家務內所提供的免費勞動。男性華人更因為父權社會對男性工作所賦予的專業，因而在洗衣服務的行業裡佔據一席之地，並維持他們在性別上的優勢，淡化了他們在美國社會可能遭受的歧視壓力。

男性華人洗衣人員與美國社會各類女性洗衣人員的關係，顯示性別和種族、階級間的關係極為複雜。由男性華人洗衣人員和一些土生白人、移民族群或黑人等女性洗衣業者的關係可以看出，有時性別因素超越了白人至上的種族觀，有時由經濟衝突所引發的種族對立態勢凌駕於性別歧見之上，並進而促使男性白人認同父權體制，產生不同階級之間的合作現象。

最後，本文發現男性華人和各種美國女性洗衣人員之間，仍然存在不平等的兩性權力關係。這群以男性為主的華人洗衣人員仍然保有男性威權體制的價值觀，而非真正改變傳統男女分工的架構。但不容抹滅的是，他們運用肢體勞動轉換物質酬勞的思維方式，彰顯洗衣工作的生產意義，再用商業經營的模式，將男性優越和專業服務、操作機器等相互連結，藉以沖淡工作中所聯想到的女性象徵或家庭勞務意涵。男性華人對這份洗衣工作的深耕勤耘，已經凸顯出他們試圖擺脫美國社會種族歧視和經濟箝制的努力。



## 參考文獻

- 王詠霓(1983)。歸國日記，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華僑史資料編輯組(編)，《晚清海外筆記選》，頁156-159。北京：海洋出版社。
- 李圭(1983)。東行日記，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華僑史資料編輯組(編)，《晚清海外筆記選》，頁110-116。北京：海洋出版社。
- 黃祐寬(1927年2月25日)。旅美華僑經濟史略(六)，《民氣日報》，第5版。
- 張蔭桓(1983)。三洲日記，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華僑史資料編輯組(編)，《晚清海外筆記選》，頁127-156。北京：海洋出版社。
- 張滿理(1983)。旅美歸僑、前《美洲華僑日報社》業務主任張滿理先生訪問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39輯)，頁322-332。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梁啟超(1983)。新大陸遊記，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華僑史資料編輯組(編)，《晚清海外筆記選》，頁186-215。北京：海洋出版社。
- 雷卓鋒(1983)。一九三三年紐約華人洗衣店聯合會成立前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39輯)，頁333-33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劉伯驥(1981)。《美國華僑史續編》。台北：黎明文化。
- 謝英明(1983)。旅美見聞雜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39輯)，頁114-15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羅記瑞筆錄，方富爾、張滿理口述(1979)。紐約華僑洗衣店的變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23輯)，頁186-203。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Anonymous(1904a).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52, 6: 80.
- Anonymous(1904b).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52, 9: 2, 56.
- Anonymous(1904c).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52, 10: 50.
- Anonymous (1905a). Wanted-washing, etc.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53, 2: 14.
- Anonymous (1905b). Washwoman's union.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53, 2: 40.
- Anonymous(1908). Some laundry history in Chicago, 1869-1882.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59, 12: 56.

- Anonymous (1909a). War declared by soldier wife laundresses. *Laundryman's Guide and Dyeing and Cleaning Trades Journal*, 1, 2: 16.
- Anonymous (1909b). Laundry industry big thing in Brooklyn. *Laundryman's Guide and Dyeing and Cleaning Trades Journal*, 1, 2: 18.
- Anonymous (1909c). *Laundryman's Guide and Dyeing and Cleaning Trades Journal*, 1, 3: 10.
- Anonymous (1909d).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laundry industry. *Laundryman's Guide and Dyeing and Cleaning Trades Journal*, 2, 5: 16.
- Anonymous (1914a). Family work.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72, 4: 30.
- Anonymous (1914b).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72, 10: 10.
- Anonymous (1915). Laundry hazards.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73, 8: 26.
- Anonymous (1916).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75, 1: 2.
- Anonymous (1921a). Visions of the laundry industry. *Laundry Age*, 1, 1: 78.
- Anonymous (1921b). Opportunities for general laundries. *Laundry Age*, 1, 1: 90.
- Anonymous (1922). Family work boosters increase ranks. *Laundry Age*, 1, 11: 1.
- Anonymous (1939). From parament to pyramids. *American Laundry Digest*, 4, 9: 80.
- Backhouse, C. (1994). White female help and Chinese-Canadian employers: Race, class, gender and law in the case of Yee Clun, 1924.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26, 3: 34-53.
- Barth, G. P. (1964). *Bitter strength: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87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ck, L. J. (1898). *New York's Chinatown: A historical presentation of its people and places*. New York: Bohemia.
- Best, E. L., & Erickson, E. (1930). *A survey of laundries and their women workers in 23 cities*. (Department of Labor, Bulletin of

- the Women's Bureau No. 78).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Boyce, C. A. (1894). *The steam laundry and its method: Essays read at the convention held at Buffalo, October, 1889*. Chicago: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 Chan, S. (1991). *Asian American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Boston: Twayne.
- Chen, D. T.-C. (1948). *Accultura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hiladelphia stud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 Chen, Y. (2000). *Chinese San Francisco, 1850-1943: A trans-Pacific community*.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L., & Bonacich, E. (Eds.). (1984). *Labor im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 Asian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World War I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ung, K.-K. (1990). The woman warrior versus the Chinaman Pacific: Must a Chinese American critic choose between feminism and heroism? In M. Hirsch & E. F. Keller (Eds.), *Conflicts in feminism* (pp. 234-251). New York: Routledge.
- Chu, D. (1982, February 18). Oral Interview, the New York Chinatown Historical Project. Interview by J. K. W. Tchen.
- Clark, H. F. (1896). The Chinese of New York. *The Century*, 53, 1: 104-115.
- Davidoff, L. (1991). The rationalisation of housework. In D. Leonard & S. Allen (Eds.), *Sexual divisions revisited* (pp. 59-9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DeArmond, F. (1950). *The laundry industry*. New York: Harper.
-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13). *13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0: Vol. 10. Manufactures: Reports for principle industries - steam laundrie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23). *14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0: Vol. 10. Manufactures: Reports for selected industrie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30). *15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30, Occupation: Color and nativity of gainful workers, Table 6 - Chinese and Japanese gainful workers 10 years old and over, by occupation and sex,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lec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52). *The appendixes of U. S. census of business, 1948, Vol. VI: Service trade-gener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75, bicentennial editi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Series G 470-494, 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by Type of Product: 1909-1929).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Department of Treasury, the United States Health Service. (1917). *Public Health Reports*, 32, 6: 230.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Dickinson, T. (1984). Gender division within the U. S. working class: Households in the Philadelphia area, 1870-1945. In J. Smith, I. Wallerstein, & H.-D. Evers (Eds.), *Households and the world economy* (pp. 199-211).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Di Vernon, J. (1891, January). The Chinese as house servants. *Good Housekeeping*, 12: 20-22.
- Dong, Z. N. (1923). *Chinese family life in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 Du Bois, W. E. B. (1996). *Philadelphia Negro: A social study*.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Edward, R. (Ed.) (1879). *Industries of Pittsburgh: Trade,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review for chamber of commerce of Pittsburgh*. Pittsburgh, PA: Edwards.
- Elshtain, J. B. (1981).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Wome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stes, S. (2000). "I AM A MAN!": Race, masculinity, and the 1968 Memphis sanitation strike. *Labor History*, 41, 2: 153-170.

- Faison, J. (1906, March). The virtues of the Chinese servant. *Good Housekeeping*, 42: 279-280.
- Fletcher, F. B. (1922). Selling laundry service. *The yearbook of the thirty-ninth annual convention, Laundryowner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held on 2-6 October 1922*(pp. 102-103).
- Frisch, P. A. (1984). "Gibraltar of Unionism": Women, blacks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Butte, Montana, 1880-1900. *Southwest Economy and Society*, 6, 3: 3-13.
- Gaw, K. (1988). *Superior servants: The legendary Cantonese amahs of the Far East*.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lenn, E. N. (1986). *Issei, Nisei, war bride: Three generations of Japanese American women in domestic service*.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Goellnicht, D. C. (1992). Tang Ao in America: Male subject positions in *China men*. In S. G.-L. Lim & A. Ling (Eds.),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 (pp. 191-212).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Holt, H. (Ed.). (1990). *The life stories of undistinguished Americans: As told by themselves*.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 Honeyman, K., & Goodman, J. (1998). Women's work, gender conflict, and labour markets in Europe, 1500-1900. In R. Shoemaker & M. Vincent (Eds.), *Gender and history in western Europe*(pp. 353-376). London: Arnold.
- Hunter, T. W. (1997). *To 'joy my freedom: Southern Black women's lives and labors after the Civil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urtado, A. L. (1999). Sex, gender, culture, and a great event: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8, 1: 1-19.
- James, R. M., Adkins, R. D., & Hartigan, R. J. (1994). Competition and coexistence in the laundry: A view of the Comstock.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25, 2: 164-184.
- Katzman, D. M. (1978). *Seven days a week: Women and domestic service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

- sity Press.
- Kim, E. H. (1982).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Kimmel, M. S. (1996). *Manhood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 Kingston, M. H. (1980). *China men*. NEW YORK: Knopf.
- Kung, S. W. (1962). *Chinese in American life: Some aspects of their history, status, problems, and contributions*.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Kwong, P. (1979). *Chinatown, New York: Labor and politics, 1930-1950*.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Lamphere, L. (1987). *From working daughters to working mothers: Immigrant women in a New England industrial commun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aundryowner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1927). *The yearbook of the forty-fourth annual convention, Laundryowner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held on 10-14 October 1927*.
- Lee, R. H. (1960).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ight, I. H. (1972).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usiness and welfare among Chinese, Japanese, and Black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n, Y.-T. (1948). *Chinatown family*. NEW YORK: John Day.
- Loewen, J. W. (1971). *The Mississippi Chinese: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ou, R. (1982). *The Chinese-American community of Los Angeles, 1870-1900: A case of resistance, organ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CA.
- Mack, P. B. (1929, April). Textiles from test tubes. *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 6: 753-757.
- Miller, S. C. (1969). *The unwelcome immigrant: The American image of the Chinese, 1785-1882*.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ohun, A. P. (1999). *Steam laundries: Gender, technology, and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1880-194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Nienburg, B. M., & Blair, B. (1936). *Factors affecting wages in power laundries* (Department of Labor, Bulletin of the Women's Bureau No. 143).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Peffer, G. A. (1986). Forbidden families: E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Chinese women under the Page Law, 1875-1882.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6, 1: 28-46.
- Phillips, A., & Taylor, B. (1980). Sex and skill: Notes towards a feminist economics. *Feminist Review*, 6: 79-88.
- Rousset, H. (1917). The laundries of the ancients. *Scientific American Supplement*, 83, 2152: 197.
- Salmon, L. M. (1972). *Domestic service* (Reprinted ed.). NEW YORK: Arn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7)
- Schwartz, J. A. (1937). Pricing the shirt that sells the bundle. *The American Laundry Digest*, 2, 6: 24-25.
- Scott, J. W. (1988).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iu, P. (1987). *The Chinese laundryman: A study of social isolation* (J. K. W. Tchen, E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Steiner, S. (1979). *Fusang: The Chinese who built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 Sung, B. L. (1967). *The story of Chinese in America: Their struggle for survival, acceptance, and full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Collier Books.
- Taylor, I., Hurwitz, M., & Held, S. (1937). *Survey of the laundry industry*. NEW YORK: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Project 6006.
- Tchen, J. K. W. (1999).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Orientalism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ulture, 1776-188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Tom, T. (1981, January 9). Oral Interview, the New York Chinatown Historical Project. Interview by Judith Luk.
- Wu, C.-S. (1983). *The Chinese in Pittsburgh: A changing minority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82).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44/06: 1899A.
- Yu, R. (1992). *To save China, to save ourselves: The Chinese Hand Laundry Alliance of New York*.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Yung, J. (1995). *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he Missing Chapter of Racism - The Gender Aspects in the Lives of Chinese Laundry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World War II**

*Hsiu-hui Wang*

### **Abstrac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roles of race and gender in the lives of Chinese laundry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World War II. Focused on laundry work, the study investigates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undries, along with the changes of work and family among American women; and secondly how these changes affected the work experiences and lives of Chinese laundrymen. As the study indicated, articulated by systems of race and gender, laundry work was organized to produce and reproduce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power. Depending on their race,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gender in different ways. Chinese laundrymen were regarded as substitutes for American women doing domestic work, and thus became outcaste from the power politics. Under the mechanism of patriarchy and racial hegemony, American white society integrated complicatedly the gender issue with its racial relations. Ye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ercial laundries and the stress on professionally laundering men's shirts, Chinese laundrymen employed various ways to reduce gender implications of laundry work and eventually to struggle against the racism and economic restrictions.

**Key Words:** racism, gender, Chinese laundrymen